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式的演进历程、逻辑及展望

赵庆年,李玉枝

(华南理工大学,广东 广州 510641)

摘要: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式的几个阶段是演进式的,并不是后一个阶段完全取代前一个阶段,而是一种后者包容前者、内涵不断丰富发展的关系。从演进逻辑来看,价值取向支配高等教育发展方式演进的方向选择,时代使命决定高等教育发展方式演进的动力来源,主要矛盾引导高等教育发展方式演进的实践内容。未来我国高等教育应该强化本体价值,承担多重使命,立足主要矛盾,实现导引式、协同式、纵深式发展。

关键词:高等教育;发展方式;演进历程;逻辑;展望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485(2021)08-0034-09

DOI:10.16697/j.1674-5485.2021.08.005

高等教育的发展必然涉及发展方式的选择,发展方式是实现高等教育发展目标的方法、手段和模式的统一,是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呈现的诸多发展性特征的总和,包含了从微观教学到宏观决策的多个方面。^[1]随着经济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和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的不断跨越,高等教育发展方式都可能与新的发展需求不相适应,从而需要转型。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与高等教育发展方式的转变密切相关。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厘清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式的演进历程与变迁逻辑,能够为加速推进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式转型、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高等教育道路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一、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式的演进历程

高等教育发展方式是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呈

现的发展性特征的总和,因此可以从不同角度对发展方式展开探究,从而更加系统全面地把握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式的具体形态和内容。从外部国际环境的角度来看,高等教育发展方式呈现出由“封闭守旧,外部依赖式”向“开放适应,自我发展式”演进的总特征;从国内宏观社会环境的角度来看,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式呈现出由“行政主导,统包统办式”向“宏观调控,微观放权式”演进的总特征;从高等教育自身数量与质量的关系角度来看,高等教育发展方式呈现出由“扩张规模,外延增长式”向“提高质量,内涵建设式”演进的总特征。下面对其具体内容展开分析。

(一)由“封闭守旧,外部依赖式”到“开放适应,自我发展式”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多年里,整个社会环境是自成一体的封闭体系。在这段时期内,中国的高等教育也呈现出一个自我封闭的状态。在高

收稿日期:2021-04-03

作者简介:赵庆年,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玉枝,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生。

等教育国际交流方面,由于处于东西方对峙和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外交上孤立中国,在经济和科技上对中国实行封锁,阻碍中国对外交往,我国高等教育只能采取“一边倒”的方式与“东方阵营”国家往来,高等学校的国际开放程度也很低,对外交流的人数、规模、国别都十分有限。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高等教育与苏联、东欧国家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和保持了交流合作关系。其中主要是与苏联开展对外交流,包括向苏联派遣留学生、学习苏联高等教育管理和制度等方面的经验、聘请苏联专家来华指导工作、大量引进苏联高教教材及教学理论和方法等。随着我国与苏联关系的日渐恶化,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开始转向民族独立国家和部分资本主义国家,合作领域包括派遣出国留学和接收来华留学生、聘请外国专家来华工作、派遣出国教师等方面。^[2]在高等教育发展理论研究及实践层面上,我国对国外的高等教育理论及经验的依赖性很高。我国高等教育总在学习借鉴他国经验,并且在苏联、欧洲、美国、日本等发展模式之间不断摇摆,一直处于模仿跟跑状态。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全面模仿学习苏联模式,在教育结构、制度及人才培养模式等各方面效仿,这个阶段的高等教育完全是为国家及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改革开放后,我国又开始仿照欧美模式发展高等教育。模仿学习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是主流意识,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影响深远,但同时也为高等教育发展带来了很多问题。对其他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方式形成的“路径依赖”,导致我国高等教育缺乏本土特色和国际竞争力。^[3]

1978年以来,在改革开放政策的引导下,我国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范围得到拓展,开始与西方发达国家加强往来。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采取了更加积极的对外开放政策,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方式进入了新的转变时期。此后,我国开始大量派遣出国留学人员,逐步开放来华留学教育,高校的对外交流与合作蓬勃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使国际化高素质人才的需求大大增加,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开始面向世界范围。为较快促进高等教育国际化,中外合作办学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逐步成为一种重要的办学形式。中外合作办学引进新的办学模式

和机制,促进了高等教育投资主体向多元化发展,增强了我国高等教育供给能力和多样性,推动了高等教育课程国际化,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对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9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学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自主开展与境外高等学校之间的科学技术文化交流与合作。”这标志着高等教育国际交流合作取得了立法上的进展。进入21世纪后,我国高等教育还在对外汉语教学和推广、开展双语教学和引进原版教材、课程国际化、推进高等教育文凭和学位的国际互认等领域取得相当大的进展,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加深。^[4]2001年底,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WTO的相关协定要求其成员国开放教育市场,“高等教育服务”被纳入服务贸易的范畴,主要包括提供远程教育服务、鼓励出国留学、提倡境外办学、鼓励专业人才流动等方式。这一阶段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增添了很多新的内容,在境外办学方面有很大的建树。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置于前所未有的高度,提出高等教育要肩负“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职能,首次将高等教育的使命上升至推动人的全面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人类共同进步等高度上来。2013年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使得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密切,高校面临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竞争,我国高校不断扩大交流与合作,主动学习世界先进的理念方式,推动高等教育向更深层次发展。^[5]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渐深入,我国也逐渐以更加开放和理性的态度对待国际高等教育理论和经验,既广泛借鉴国际高等教育的先进经验与理念,又重视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来制定重要的发展方略。

(二)由“行政主导,统包统办式”到“宏观调控,微观放权式”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式呈现出高度统一的特征,政府对高等教育发展拥有绝对的主导权。高校的专业教学管理、财政经费管理、招生管理及毕业生分配、机构设置及人事安排等,全部由政府主管部门决定和控制。如在学科专业结构调整方面,从历次专业调整来看,都是学校按照政府出台的政策执行。高校基本上没有开设新专业的自主权,必须按照国家主管部门

颁布的专业目录设置专业。从1953年的第一个专业目录到1998年第四个专业目录,都是国家一手操办。^[6]再如在财政经费方面,采用的是中央统一计划、统一分配的高等教育财政体制。新中国成立后直到改革开放前,我国高等教育经费都是只来源于各级财政的统一拨款,主要以“基数+发展”的方式分配高等教育经费,这种经费分配方式是一种渐进式的、以历史的支出结果为基础的方式,由于该时期我国高校数量较少、结构单一,这种方式比较简便易行。^[7]在毕业生就业方面,依据国家实际发展和需要,切实保证重点经济建设部门的人才需求,国家决定对大学毕业生实行集中负责、按计划统一分配的就业方式。在高校人事管理和安排方面,高校人力资源配置方式主要是行政等级制。高校的教职工队伍按照行政计划进行建设,所有的福利待遇都与其职务职级紧密相关,论资排辈、论权分配是主要的资源调控手段。

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建立,高等教育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社会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政府与高校之间传统的关系所赖以存在的基础也日渐削弱,因此政府对高校的管理逐步向宏观调控、微观放权方式转变,高校逐渐由过去单纯地面向政府办学转为面向市场和社会需要办学,并且逐渐拥有独立自主的办学权。《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出台及法律法规的颁布,使我国高校办学自主权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落实与扩大,政府也不断调整和下放高等教育管理权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高校可以依据经济社会的需求、自身的办学条件及办学规模来制定招生方案、调整各系科各专业的招生比例,并且可以对专业设置提出意见,此外高校的科研自主权也基本得到落实。二是高等教育经费分配与管理方式发生了变化,高等教育投资体制不断完善,资金的利用效率逐渐提高,财政拨款转变为中央和地方两级拨款,拨款方式转变为“综合定额+专项补助”的方式,增加了高校安排经费的主动性、自主性及经费管理责任。此外,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和成本补偿制度逐渐确立,多元化投资渠道得到拓展,全额收费的民办高等教育也逐步兴起。三是大学生就业方式逐渐转

变,经历了“供需见面、政策公开”的过渡方式,再到后来的“双向选择,自主择业”方式。到2000年,大学生就业完全结束了“计划、分配、派遣”的历史,步入了以市场为导向的轨道,就业方式主要包括高校推荐、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双向选择、毕业生自主择业等。四是高校在人事管理方面逐渐拥有一定的自主权,如在教职工薪酬方面,国家标准部分由政府统一承担和调整,但高校可以自主确定津贴部分的标准。教师人事管理体制也以实行聘任制和分级流动制为主要特征开始改革。^[8]进入21世纪之后,高等教育发展日新月异,高等教育发展方式也越来越具有弹性。2010年7月,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要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实施简政放权,对高等教育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提高公共教育服务水平。2015年,教育部发布《关于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 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若干意见》,提出要构建多主体参与的高等教育评价体系,逐步形成“政府管、学校办、社会评”的高等教育互动生态。2018年3月,教育部又提出要进一步向地方和高校放权,改革高校编制与岗位管理制度,给予高校依法自主招聘人才的权利。^[9]一系列的行政举措都明显地反映出高等教育发展方式在逐渐向更灵活多元的态势演进。

(三)由“扩张规模,外延增长式”到“提高质量,内涵建设式”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式以“外延式扩张”为主要特征,表现为普通高校数量的快速增加。该时期为了弥补“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人才断层,满足改革开放后经济社会建设的需要,国家不仅恢复了现有高校的招生,还新建建设了一批高校,但高校有限的培养能力使其仍不能充分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1983年邓小平提出要成倍发展大专院校。^[10]这种社会形势促使各主管部门都拥有很高的办学积极性,高校建设的速度也加快,但是校均规模并没有很大变化。由此可见该时期的高等教育主要是以新设高校来实现高等教育规模总量的扩大,是一种外延式的扩张方式。20世纪80年代末到1998年,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方式以“内涵式扩张”为主要特征,表现为高校数量的稳定甚至减少,校均规模出现大幅度的增长。为了有效地适应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的需

要,高等教育逐步深化了体制改革,重组了高等教育资源,高校布局也日趋合理。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规模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人民日益增长的高等教育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1999年,我国政府做出了大幅度扩大高校招生规模的决策,高等教育内涵式和外延式发展并重,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步伐加快。伴随着数量的扩张,高等教育系统在观念、功能、结构等方面也产生了许多质的变化。高校扩招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大,主要表现在高等教育在校生总规模迅速增加、学校总数增加及校均规模显著提高三个方面。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来看,1998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为9.8%,扩招以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迅速攀升,仅用6年时间就提高到20%,进入成熟的大众化阶段。^[11]

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是在短时期内依靠一种超常规发展方式来实现的,这种发展方式的主要追求和特征就是高等教育数量和规模的突破。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表明,质量始终是制约高等教育发展的关键因素,发展不只是数量扩张的过程,同时也是质量不断提高的过程,需要依靠提高质量来巩固数量增长。因此,在大众化发展中后期,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式逐渐从“扩张规模,外延增长式”转变为“提高质量,内涵建设式”。2006年5月,温家宝总理指出,高等教育要适当控制招生规模增长幅度,相对稳定招生规模,切实做到以提高质量为重点,推动高等教育科学发展。国家在专业设置和专业结构调整、课程和教材建设、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和评估制度等方面作出宏观指导和调控,并通过制定相关改革措施和激励政策,引导各界共同关注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12]“211工程”“985工程”“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等的实施和推进,也充分体现了高等教育重视质量的内涵发展方式。《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对教学改革给予了高度重视,明确提出要实施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13]2008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等联合启动“遵循科学发展,建设高等教育强国”重大研究项目,突出体现了高等教育整体质量对国家科技和人才实力的决定作用。2012年8月,国家“万人计划”项目实施,强调重点人才重点支持、特殊人才特殊培养,壮大高层次人才队伍。2017年“双一流”建设的贯彻落实推

动了我国高等教育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的进程。2018年召开的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快建设一流本科教育,高等教育要以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为主题。这些举措都有力地促进了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14]此外,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质量观也是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循序转变。20世纪90年代以前高等教育质量的标准是整齐划一的,是一种旨在实施管理、规范的工具。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到来促使高等教育的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高等教育质量就是高等教育满足消费者或投资者需要的程度。高等教育越是能够满足社会不同主体的不同需要,质量就越高。进入21世纪,高等教育开始致力于为未来的社会培养人才,“促进发展”成为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内涵,在未来的社会中,高等教育质量在于通过自身人才培养与知识创新从而提升推动社会进步的能力和程度。^[15]

整体来看,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式的几个阶段是演进式的,并不是后一个阶段完全取代前一个阶段,而是一种后者包容前者、内涵不断丰富发展的关系。我国历来选择的高等教育发展方式不能说是很成功的方式,但却是符合时代背景的最佳方式,既推动了高等教育的发展,同时也衍生出来很多新的问题,但这是发展方式必然经历的过程。因此,随着历史时代发生变化,高等教育发展方式又应该作出新的调整。

二、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式的演进逻辑

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演进的宏观视域中系统梳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式,有利于进一步理清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式的演进逻辑,为今后高等教育发展方式的转变提供经验和理论支撑。从价值逻辑来看,高等教育发展方式转变是高等教育内涵不断丰富的应然体现,是人们对高等教育本质深入认识的结果;从历史逻辑来看,高等教育发展方式转变是对我国面临的时代使命的自觉回应,灵活适应、开放多元、提质增量的高等教育发展方式内在地体现了我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时代必然性逻辑;从现实逻辑来看,高等教育发展方式转变是国际国内形势的必然要求,是化解高等教育主要矛盾的内在需求,能够盘活高等教育发展的力量,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竞

争力及话语权。

(一)价值逻辑:价值取向支配高等教育发展方式演进的方向选择

从价值逻辑来看,高等教育的价值取向支配着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式的转变方向,对高等教育发展方式的选择乃至整个高等教育都具有重大的影响。高等教育价值取向是高等教育主体根据高等教育的核心要素及自身需求在对高等教育进行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时所表现出来的一种价值倾向性,对高等教育目的的确立、高校人才培养目标的确立、高等教育功能的选择及高等教育活动的评价都有着深刻的影响。^[16]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对高等教育价值取向进行不同的分类:依据利益主体来分,包括国家本位、学校本位、社会本位和个人本位;依据服务方向来分,包括政治目标、经济目标、学术目标及市场目标;依据培养对象来分,包括精英取向、大众取向、通才取向、专才取向、知识取向、素质取向。在一定时期内,价值取向能够使高等教育向一定的目标发展,通过发挥主体的能动作用,创造出具有特定价值的高等教育方式。^[17]高等教育系统的复杂多样性决定了高等教育价值取向具有多元性的特点,但每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总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取向。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政治革命和经济建设的双重任务,高等教育价值取向以“国家本位,政治中心”为主轴取向,高等学校是国家的事业单位,其主要任务是为国家培养储备干部,此时的高等教育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为提高高等教育的管理效率,高等教育管理体制高度集中,在人才培养模式上计划统一。经过几年的过渡和准备时期,我国逐渐拉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帷幕。为了更好地服务工业化建设,教育部明确要发展工业学院,尤其是单科性专业学院,此时“培养专才,重视知识”的高等教育价值取向得以形成和强化,高等教育发展方式呈现出功利实用的追求倾向。这种方式阻碍了学生的个性发展,导致人才适应面较窄,不利于人才的全面发展。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高等教育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日益增大,“经济中心,适应市场”的价值取向逐渐确立,计划经济时期的高等教育发展方式已无法为继,市场化的高等教育发展方式成为必然选择。因此,国家逐渐释放高等教育的管理权限,让

高等教育发展方式更具弹性和灵活性,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使高等教育为推动经济建设提供智力支持。跨世纪之际,为推进高等教育民主化进程及拉动内需,高等教育价值取向逐渐由“精英取向”转为“大众取向”,高等教育采取了外延扩张式发展方式,重视数量规模的提升,该方式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奠定了坚实的规模基础。到高等教育大众化中后期,高等教育公平、高等教育质量问题日益凸显,此时“素质教育”“以人为本”的价值观逐渐受到重视,高等教育更大程度上被看成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基本途径,高等教育逐渐回归人才的培养及知识的传承与创新。追求高等教育公平、提升高等教育质量、自主开放及多元化治理、加深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成为高等教育发展方式的主体,因此高等教育发展方式又逐渐演变为重视高等教育内在逻辑的内涵式发展方式。总的来说,高等教育价值取向支配和影响高等教育发展方式的选择,发展方式要与发展的价值观和理念相适应,才能更好地推动高等教育正向发展。因此,在高等教育发展方式演进的过程中,高等教育价值取向是根本,为方式的转变确定了战略方向。

(二)历史逻辑:时代使命决定高等教育发展方式演进的动力来源

从历史逻辑来看,高等教育所处的社会历史阶段深刻影响着高等教育发展方式的转变,高等教育的时代使命决定发展方式的演进由何种动力推进。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斗争激烈,由于受到旧中国极其落后的社会状况的影响,国家经济也十分落后,工业不发达,科技需求量少,教育投入不足,百废待兴。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高等教育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承担着为新中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维护国家主权以及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时代使命。此时,以政治力量为核心的外部需求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式形成和转变的绝对动力,政府对高校实行全面的权力控制,行政力量主导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式。“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教育的使命被窄化为服务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该阶段的所有高等教育实践都是源于政治的需要,中央集权、统包统办的特征十分突出,高校也完全沦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成为

一个被动执行者的角色。改革开放使我国高等教育走上了调整与改革的良性发展道路。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颁布成为高等教育发展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标志,开启了高等教育改革的历史征程。1992年,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此后,在“科教兴国”战略下,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教育政策法规,为新世纪的高等教育发展制定规划。^[18]在我国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并不断深化的这一段时期里,高等教育所处的历史背景更为复杂,高等教育发展的目标也开始多元化。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治国理念的确立,高等教育发展方式面临的宏观大背景逐渐演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高等教育承担的时代使命逐渐演变成为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为经济建设培养合适的人才,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撑。此时,经济力量开始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政府引导与市场驱动相结合逐步成为高等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动力来源,激活高校自身积极性也受到重视,高等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广度和深度也都有了较大的变化。但整体来看,政府、高校、市场之间在竞争中的地位还不平等,高校对政府还有较大的依附性,市场竞争能力还有待发展提高。^[19]进入21世纪之后,高等教育承担的时代使命越来越复杂、层次也逐渐拔高,高等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动力来源也逐渐多样化。

(三)现实逻辑:主要矛盾引导高等教育发展方式演进的实践内容

从现实逻辑来看,当高等教育发展方式演变的方向和动力确定之后,就要解决如何迈开步伐、实现方式转变的问题。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式的历史实践中可以发现,高等教育发展阶段面临的主要矛盾是高等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立足点,引导高等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具体形态和内容的确定。纵观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式演进历程,当高等教育面临总量性的主要矛盾时,数量规模、绝对的量化指标评价、功利化导向、封闭守旧式发展和行政化思维统一管理等便是有效的发展方式组合。随着主要矛盾由数量性矛盾转化为结构性矛盾,保证教育质量、实现教育公平、培养人才、科学研究、知识创新、开放适应、全局思维等就成为高等教育发展方式具体形态的主要体现。总量性矛

盾具体表现为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素质专业人才数量需求增加与高校人才培养供不应求的矛盾、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与有限的培养能力的矛盾等。对于此类矛盾,我国通过行政力量的干预、加大高校硬件设施投入、推进高校规模建设、扩招高校学生、提高毛入学率等手段,在一定程度加以解决,但同时也积累了如高校教育质量滑坡等一系列新的问题。当高等教育处于低发展阶段时,会更加关注高等教育外在的显性目标,如教育规模、发展速度、学校数量等,此时的高等教育发展思维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经济的增长需要高等教育提供更多数量的人才,高等教育的规模和质量若不能跟上经济发展的脚步,则不能满足经济发展对于人力资源的需求,从而会阻碍经济的长期发展。^[20]当高等教育发展进入更高阶段的时候,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在隐含目标和适应性等问题就逐渐成为重点关注的目标。^[21]因此,高等教育主要矛盾逐渐上升为结构性矛盾,具体表现为高等教育质量与政府希望、百姓期盼及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不相适应的矛盾。此时,高等教育发展方式的内容也发生变化,主要表现为调整和优化结构、重视和提高质量、改革和创新体制、更新和升级人才培养模式等。总的来说,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发展方式转型中具体内容选择的依据和来源,是发展方式演变的重要逻辑切入点,涉及到具体怎么做的问题,这也是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所在。

总的来说,价值逻辑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式转变指明了前进方向,历史逻辑决定了促使高等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动力来源,现实逻辑为高等教育发展方式转变提供立足点。三重逻辑互为支撑,共同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式转变提供逻辑基石。

三、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式演进的未来展望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式的演进与时代环境和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阶段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及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的到来,我国高等教育又将处于新的历史阶段。在新的历史阶段,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已不仅限于物质经济水平的增长,而是在物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重视追求经济结构的优化、科技文化的增强、

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以及国民生活质量的提高。高等教育是人才培育的基地,是社会发展的主要依靠和动力之源,是国家强大的基础和直接生产力。面临新的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我国高等教育不能再延续从前的发展方式,否则将很难实现我国高等教育的科学、可持续发展。^[22]从当前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来看,我国高等教育已迈入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主客体需求变化对高等教育发展方式也提出新的要求。结合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式演进的历程与逻辑,未来我国高等教育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以实现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方式的转型。

(一)强化本体价值,实现导引式发展

高等教育的本体价值应当包括育人价值与高深知识的创造价值两方面。未来我国要想提升国际竞争力,实现高等教育科学可持续发展,必须要深刻认识高等教育的本质,重视和强化高等教育本体价值,实现高等教育导引式发展。过去我国的高等教育以提升“适应性”为核心,将重点放在适应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上,高等教育的工具性价值取向突出。但是,经济社会的变革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既有积极的影响,同时也有消极的作用。比如,受利益机制的驱动,市场经济环境下的方式选择可能带有一定的趋利性和短视性。随着社会主义的不断革新和完善,以及新科技革命和信息智能化社会的推进,高等教育推动社会变革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未来我国高等教育要树立更加长远的发展理念,充分发挥高等教育的能动作用,发挥高等教育作为主体的自觉判断和选择作用,在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积极参与、导引经济社会的变革与发展。实现高等教育导引式发展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高等教育要贯彻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培养既能适应当今世界又能创造未来社会的新时代人才。蔡元培先生曾说:“要看明天的社会,先看今日的校园。”高等教育主要是通过塑造新人来实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先导性作用。未来要促使高等教育通过促进个人发展来促进社会发展,兼顾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功能的统一,以人的现代化和发展反哺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发展,实现高等教育在价值取向上的理性选择,才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因此,未来我国高等教育要重视基础学科,

强化通识教育,全面提高人才的综合素质与能力。二是我国高等教育要加强高深知识的研究和创造,提升高等教育内容的前瞻性和创造性。从当前发展形势来看,知识创新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主导和决定性的因素。高等教育通过知识创新可以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从而对整个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变起到一定的导引作用。未来我国高等教育要重点培养和打造部分精英人才,这部分精英人才可以创造知识并且将科学知识转化为生产力,既推动高等教育发展,也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也为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中国贡献。

(二)承担多重使命,实现协同式发展

高等教育是一个丰富的、复杂的社会子系统,这也意味着高等教育不能完全脱离外部环境,否则高等教育活动将失去意义及实践支撑。因此,高等教育在履行本体职能之余,也将在一定程度上肩负起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多重使命。未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式将会越来越受到不同利益群体多元化诉求的影响,如政府、市场、高校、其他社会组织等。因此,未来我国高等教育应继续优化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及高等教育结构体系,形成多元主体协同式发展态势。一是要在高等教育治理上实现协同。要改善政府宏观管理机制,从宏观层面保障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保证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与高校办学方向,保障高等教育发展的效率与公平;要重视和发挥市场调节机制的作用,在高等教育治理过程中引进更多利益相关者参与高校共建,促使政府、市场和高校三大主要利益主体实现适度合作,通过市场行为来促进优胜劣汰,实现多元主体的利益均衡;要加强高等教育立法,切实落实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提升高校的办学积极性,保障高校的学术环境自由。减少行政力量和学术力量之间的矛盾,科学划分行政和学术权力的界限。二是要在高等教育结构上实现协同。要优化高等教育区域布局结构,协调平衡区域间高等教育优质资源配置。高等教育布局结构应向下延伸,整体提升地方高等学校培养高层次人才的能力,培育高水平地方性特色一流大学,以满足区域经济发展对人才培养的需要,促使地方综合实力与国家综合实力协同提升;要调整高等教育类型结构,使高等教育走出“同质化”发展的误区。在高校建设上要分类别、有重点,合理

规划研究型、应用型、职业技能型等高等学校的比例,引导各类高校特色化发展,协同为国民日益增长的高等教育需求提供多样化的服务,提升国民素质;要协调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对专科、本科、硕士、博士各个层次的人才精准定位,合理制定各层次教育的培养目标,充分发挥各层次高等教育的作用,为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培育多样化优质人才。

(三)立足主要矛盾,实现纵深式发展

规模扩张式发展方式给我国高等教育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未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矛盾依然以“结构性矛盾”为主,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面临的重点问题依然是结构性、质量性问题。立足国内环境来看,高等教育供给与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不平衡的矛盾是高等教育面临的主要矛盾之一。这种不平衡主要体现在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供给质量与需求质量之间的不平衡。立足国际环境来看,高等教育的输入与输出存在不平衡,体现在留学生输入输出数量及质量、高等教育理论的引进和输出存在较大的逆差。因此,未来我国高等教育要加快推进结构质量的改善和提升,扩充和丰富高等教育的内涵,实现高等教育纵深式发展。首先,要深化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消除各种梗阻,重视深化推进高等教育微观结构层面的改革,深度挖掘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的潜力。一方面,高校教师是推动实现高等教育纵深式发展的重要切入点,高校教师的自身素质和教学技能直接影响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质量,是解决高等教育质量性问题的关键影响因素。因此,要加快高校师资队伍建设和对高校教师队伍实行分类建设。要依据高校人才培养类型选择和聘用高校教师,如研究型高等院校应以研究型教师为主,职业技术类院校应以职业技能型教师为主。在对教师的考核和评价上,也要依据不同的类型设定不同的标准。只有对高校教师进行准确的分类和定位,才能充分发挥每个教师的自身优势,从而使其真正为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贡献力量。与此同时,还要加强师德文化建设,提升高校教师的职业道德和职业信仰,避免被功利主义带偏,要使高校教师真正做到以教书育人、学术研究为己任。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的课程教材结构也是实现纵深式发展的关键。要重视高等教育课程教材的内容与

结构的及时调整和更新,跟上时代的步伐,以避免高校学生因“用非所学”而面临严重的就业难问题。同时也要加强通识课程的学习,强化基础,做到以能力培养为中心。其次,要进一步开拓高等教育的空间,推动高等教育多层次、多类型、多样化发展。一是要扩大高等教育的受众空间,培养更多优质生源,积极探索和创建有效的终身教育模式,加强职业技术教育、继续教育、普通高等教育之间的融通;二是要拓展高等教育教学空间,创新人才培养方式,加大信息技术的应用,形成以需求为导向的信息化环境,打造“互联网+”的高等教育教学模式,充分开拓线上教学空间;三是要持续拓展高等教育国际发展空间和合作空间,继续扎实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提高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深度融合发展,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向世界贡献中国力量,为双循环注入不竭动力。^[23]

四、结语

新中国成立70余载我国高等教育在曲折中发展,既是一部变革史,更是一部经验史。在历史的长河中,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式经历了三个不同方面的演进历程。其演进的历史实践又进一步反映出一定的价值逻辑、历史逻辑及现实逻辑规律。高等教育的价值取向、高等教育承担的时代使命、高等教育面临的主要矛盾分别影响着高等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方向、动力及内容。未来我国应把握和运用好高等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规律,从高等教育的价值、使命、矛盾等方面着手,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式逐渐向导引式、协同式、纵深式方向转变。高等教育发展方式的转变具有先导性、时代性及战略性的意义。在新的历史时代,高等教育发展方式发生新的转变之后或许又会对高等教育的形态和内容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如高等教育的功能、体制、治理体系等,这也是未来非常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21]高树仁,宋丹.论高等教育发展方式转型与战略支点的选择[J].江苏高教,2014(3):37-39.
[2][4][8][11]别敦荣,杨德广.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30年[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115-116、116-121、201-203、2-17.

- [3]李盛兵.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现阶段特征[J].高等教育研究,2016,37(12):1-6.
- [5]陈万灵,郑春生.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报告(2019)[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231-235.
- [6]张忠华.高等教育专题新论[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95.
- [7]闵维方,陈晓宇.中国高等教育经费需求与投资体制改革[J].教育研究,1994(12):30-38.
- [9]赵俊芳,刘玲.我国高等教育70年盘点及未来发展建议[J].现代教育管理,2020(4):1-9.
- [10]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6.
- [12]周济.实施“质量工程”贯彻“2号文件”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J].中国高等教育,2007(6):4-8.
- [13][18]李均.中国高等教育政策史(1949—2009)[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309.
- [14]顾永安.复兴与前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历史回顾[N].人民政协报,2018-11-21(10).
- [15]史秋衡,陈蕾.中国特色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体系的范式研究[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18-20.
- [16]董泽芳,张继平.中国高等教育价值取向70年变迁的历程、特点与发展思考——董泽芳教授专访[J].重庆高教研究,2019,7(5):14-22.
- [17]董泽芳,黄建雄.60年我国高等教育价值取向变迁的回顾与思考[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50(1):132-139.
- [19]张应强,张浩正.从类市场化治理到准市场化治理:我国高等教育治理变革的方向[J].高等教育研究,2018,39(6):3-19.
- [20]李立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下的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建设:逻辑框架与作用机制[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9,40(6):10-19.
- [22]陈先哲.从“超常规”到“新常态”: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式转型[J].高等教育研究,2016,37(4):1-8.
- [23]高书国.后普及教育时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空间[J].现代教育管理,2020(10):1-9.

责任编辑 徐治忠

Evolution, Logic and Prospect of the Development Mode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ZHAO Qingnian, LI Yuzhi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41)

Abstract: Several stages of the development mode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are evolutionary, not that the latter stage completely replaces the previous stage, but that the latter contains the former and enrich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no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volution logic, value orientation dominates the direction choice of the evolu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mode, the mission of the times determines the motive source of the evolu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mode, and the main contradiction guides the practical content of the evolu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mode. In the future, higher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should strengthen the noumenon value, undertake multiple missions, base on the main contradiction, and realize the development of guidance, cooperation and depth.

Key words: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evolution; logic; outlook